

当代诗
歌
观
察
笔
记

张清华 著

我清楚地记得它既温暖又冰冷。知道火山的前夜不止是看壮观的美景，还有烟火弥漫的危险。知道江河的决堤不止是看一泻千里的畅快，还有身沐一切的可能后果。但总归青春会痛，痛苦总会过去。生要自爱，死要自洁。越荒凉的地方，越有精神的力量。越危险的地方，越有智慧的光芒。只有冷静清醒的观察者，才能看到这一切。

穿越尘埃与冰雪

西北大学出版社

我清醒地记得它的文路与去向，如萤火虫的呼吸不止是有诗观的支撑，还有烟火弥漫的危险，知道江月的决堤不止是有一角
开垦的痛快，还有洗涤一切的可怕后果，但总归清醒自清，也有自污，尘埃自污，冰雪自污，这污秽的时代里，自有精神的
灯火照亮无边的黑夜，这喧嚣的尘世里，自有沉静清凉的水雪冲刷着醒来的天空。

张清华 著

当代诗歌观察笔记

穿越尘埃与冰雪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尘埃与冰雪：当代诗歌观察笔记 / 张清华著.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604-2790-4

I. ①穿… II. ①张… III. ①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5328号

穿越尘埃与冰雪——当代诗歌观察笔记

作 者：张清华 著

出版发行：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710069

电 话：029-88302590/8830359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装：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21

版 次：2010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331千

书 号：ISBN 978-7-5604-2790-4

定 价：36.00元

自序

什么样的尘埃与冰雪

在英国人最初发动并输出“工业革命”几个世纪以后，中国人也终于开始相信“发展”的神话了。但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没有料想到会遇见一个可怕而无法回避的词语——“排放”。积累日久的、过量的“排放”，正在让人类和我们这个亟待发展的民族饱尝欲望和急功近利的后果。早先还只是污染物的排放，最近则是叫做“温室气体”的排放，据说两极的冰雪正在加速融化，海平面正在不可逆转地上升，海洋的“pH值”正在变酸，大气环流正在发生结构性的改变……过若干年之后，人类将彻底失去现有的一些重要的生存条件。我们居住的星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的周身，正在发生着越来越多意想不到的灾害。大气中飘满了烟尘，极端天气到处肆虐。

不过，这样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饱汉与饿汉的想法不同，责任也是不同的，我们还是相信先发展了再说、先把饿汉变饱汉的硬道理。再说这样的问题也不属于我们论题的范围，我这里要说的只是，同样的问题也反映在文化和精神世界中，反映在了诗歌

领域中。半个多世纪前，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之夜”大概也已经不再存在了——即便是文化或精神意义上的黑夜，毕竟也还有一丝静谧和安详的幸存；哪怕是一片绝望的死寂，也还有一番黑夜的时光可以消磨。而今则是灯火彻夜通明，沸腾的喧嚣与滚滚喷吐的二氧化碳，一起充塞于夜空，无边际的资讯爆炸和流行的消费文化，淹没了我们的耳目与视听。不但“诸神”已了无踪迹，甚至连关于这一切的叙述和传奇也鲜有人再有兴趣提起。在精神的星空中，可谓布满了浓雾般的烟尘，响彻着嘉年华会般娱乐至死的笑闹声。

每个时代都有“末世论”或“盛世危言”之类的叙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世界上专门有这样的人靠讲述此种神话来推销自己的名声和理论，续写杞人忧天的笑话。但我并不需要，我当然不相信人类会在多长的时间内毁灭，也不大相信文化和文明会出现毁灭性的危机预言，但是当我们通过诗歌这样一种精神形式，一个语言的世界去感受这个动荡不安的现实的时候，确有一种特别的忧喜交加、五味交杂的感受，有一种似梦如幻、过山车般的剧变与陡转的刺激。在这个世界中，同样有着遮天蔽日的烟尘，有忘乎所以的欢闹和亢奋，和如被冰雪的警醒与悲凉。

置身 90 年代的人们不会预料到有今天这样一个写作的时代：不只一元的权力架构不再有效，二元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虚构并立也早已瓦解，无数的写作者和群落蜂拥而至，借用网络、纸刊和民间媒介构成了一个新的江湖世界。原来的文学体制，阅读和发表的门槛与规矩已经失去了权威，起作用的只有一个与具体现实利益相勾连的“并不通用”的评价系统——在某个部门得奖或获得擢升，与在读者心目中成为好的作者完全不是一码事了。也许整个文化界的结构性变化还并未实现，甚至在整个文学界的旧格局也还仍未消失，但至少，在诗歌领域里，这种变化却已成为铁一般的事实。有人批评当代的诗歌写作与娱乐化的流行文化沆瀣一气，这不无道理，但反过来一想，这个娱乐化和民间化的通道，不也同样打破了原来的权力结构，颠覆了旧有的一套并不合理的文学体制吗？如今无数的新人在民间大地上成长，无数的爱诗人在网络和民间媒介那里自娱自乐，这难道不是值得庆幸和高兴的事

吗？从这个角度看，诗歌作为文化与艺术先锋和感受触角的角色并未消失，它仍然高居在时代的前沿和文化结构的塔尖。这个世界里虽然有蔽日的灰尘与嘈杂的噪音，但正像尘埃凝结了水汽，催生了雨滴与雪片一样，精神的生产也受益于这个自由而混乱的空间。

当我把目光一直伸向这个广阔世界变幻多端的景观中时，我产生了上述矛盾的感受。在最近的十年来，这个虚拟世界的嘈杂与生机，像这个物质和问题一起增长、财富和灾难一起涌现的生机勃勃的现实世界一样使我兴奋和感叹，让我有目不暇接的振奋和疲惫。我感到，即便这个时代的写作中垃圾远多于精品、烟尘远多于实绩，但它仍然以这种丰富的样态，见证了那个千载难逢的时代。即便我们早已不再有五柳先生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安宁，不再有施耐庵品评历史时的那种“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的超绝心境，但这仍然是一场漫长的飨宴，我目击了这个充满戏剧性和哗变感的过程，一路走来，和着由青年时代步入中年的茫然与悲凉、沉着与慌乱、超越与迷失的五味俱全的心态，经历并且记录下它磅礴又迷乱的轨迹，它斑斓又充满泡沫感的景观。

很显然，在记录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十足的进步论者，我只是在一个挤满了混乱人群的时代列车旁只搭上了一只手的人，有身体悬浮于空中、随时都有可能被甩掉的慌乱，或是一个干脆就居于这漩涡与洪流的岸边的隔岸观火者，有过剩的清醒和不能接近的隔靴搔痒的困惑。总之我只看到了一些表象，或水面的漂浮物。但我也清醒地记得它的来路与去向，知道火山的喷发不止是有壮观的美景，还有烟火弥漫的危险；知道江河的决堤不止是有一泻千里的痛快，还有荡涤一切的可怕后果。但总归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尘埃自污，冰雪自洁，在这混乱的时代里，自有精神的灯火照彻灵魂的寒夜，在这喧嚣的空气里，自有沉静清凉的冰雪洗刷着醒来的天空。

说到此处，这本书的一个小小的目的也已然显现，那就是试图要呈现当代诗歌自世纪之交以来的一个轨迹和景致，在一个并不宏大和严谨的修辞中描述一下它的格局与状况。但我也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编年史，而

只是一个人的印象与目击，一个人的观察与记录。因此，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掩饰它的单薄，我并没有将之命名为“新世纪的诗歌观察”，而是笼统地说成是“当代诗歌的观察笔记”；当然，在本书中对于历史的追溯，也是为了这一最靠近当下的观察提供一个参照和起点；为了一个修辞的需要，也放入了少量的细读与随感文字。因为刚刚编就了另一本《边缘的瞭望与向内的细读》，所以这里的个案批评的文字就显得单薄了很多，不过它们对我来说，却非是可有可无；最后一部分的访谈与答问，当然也不纯是为了凑够字数，其中有的可以作为资料参考，有的则可以用我的对话人精彩的见地，来对照自己的愚钝和浅见。

要说的话也许还有很多，但都在文章之中了。我隐隐担心的只是，虽然自己历经辛苦，把这些文字打理成书，但也许只是为如今已然过剩的文化垃圾又增添了分量。人类的排放已然太多，一本书则不止是增加了文化生产与消费的负担，而纸张也是一种紧俏的资源，生产的过程污染大、排放高，想到这里，难免有一份惶恐不安的负罪感。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寒冷和多雪的冬天，它让我们在刚刚为全球气候的前景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中获得了一丝可以缓解的幻觉。寒冷真好，冰雪真好，久违了。让我的文字的尘埃在这个寒冷多雪的冬季，好好享受一番它的冰清玉洁和清凉剔透吧。

2009年岁暮，大雪中的北京

穿越 尘埃与冰雪

当代诗歌观察笔记

目 录

自序：什么样的尘埃与冰雪 /1

第一辑

黑夜深处的火光

六七十年代的非主流诗歌思潮研究 /1

朦胧诗：重新认知的必要和理由 /27

找回的、生长的和衰弱的

近30年诗歌的一个概观 /43

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60年诗歌的一个掠影 /56

价值分裂与美学对峙

世纪之交以来诗歌流向的几个问题 /63

“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 /76

诗歌标准·网络平权·无难度写作 /85

第二辑

好日子就要来了么

世纪初的诗歌观察 /92

人民需要干货

2002年诗歌一瞥 /107

2003年诗歌阅读札记 /115

2004 年诗歌的几个关键词	/126
那狂欢的烟尘和伦理的震颤	
《21 世纪文学大系·2005 诗歌》序言	/132
在狂欢中娱乐而不至死	
2006 年诗歌观感	/144
经验迁移和秩序重建	
2007 年诗歌观察	/157
灾难, 伦理, 诗人之死和诗歌之低	
2008 年诗歌印象	/170
精神的冰或诗歌的雪	
2009 年诗歌阅读散记	/184
 第三辑	
林中路: 诗学随笔	/195
雨夜的细读	/216
大地上长出一串诗歌的果子	
关于七位山东青年诗人的札记	/229
 第四辑	
娱乐化时代诗歌何为	
答问	/254
不当人生的演员	
访谈诗人多多	/262
见证白洋淀诗歌	
访谈林莽	/269
关于当前诗歌创作和研究	
与程光炜的对话	/277
历史、谱系与个案	
关于先锋诗歌与唐晓渡的对话	/290
后记	/324

黑夜深处的火光

六七十年代的非主流诗歌思潮研究

……一种比无知可鄙得多的胡说八道，居然僭称起知识的名号，而且对于知识的复兴布下了一道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为了使人类恢复常识，就必须来一场革命。

——让-雅克·卢梭：《论科学与艺术》

心是一座古老的礁石，十九个
凶狠的夏天的熏灼……十九场沸腾的大雨冲刷，烫死
今天，暗褐色的心，像一块加热又冷却过
十九次的钢，安详，沉重
永远不再闪烁……

——根子：《三月与末日》

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当代诗歌历史的叙述中，曾有一个将近十年的“被想象的空白时期”，但随着人们对一些资料的发现和对一些诗人的重新认识，这一想象被修正了，变成了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修辞，即这个压抑时代中确有反抗的声音，宛如静寂中的空谷足音，或黎明前暗夜中的一缕星光。在笔者199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书中，曾使用了“黑夜深处的火光”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六七十年代的地下诗歌写作，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传神的比喻，虽然它也有将历史本质化和过度修辞的嫌疑。

陈思和在90年代的著述中曾提出过“潜在写作”的概念^①，将意识形态一体化时期的那些处于未发表状态的隐于“抽屉”——私人隐秘空间的个人写作置于这一范畴来考察，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辟出了一个新的线索。本文在这里所讨论的“非主流诗歌”与“潜在写作”概念所指涉的对象，有些是

有交叉的，但它主要还是指那些曾以不同寻常的方式产生了重要社会影响的作品——通过“文革”时期的公开张贴、秘密传抄、小范围的感染影响等方式，来产生社会影响的作品。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不管文本是否是通过“发表”这样的权力授予形式，还是通过“传抄”这样的民间自动获得形式，其传播事实是否存在和效率的大小，才是真正值得注意的要素。否则其历史的价值会遭致怀疑。

对于这一“非主流诗歌思潮”的精神内核的研究，笔者在《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一书中曾冠以“启蒙主义”的名称，认为它与后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和崛起的“今天派”与“朦胧诗”形成了内在的历史联系，并成为了后者的前驱，它们一起引领了中国当代先锋性的文学运动与文化思潮，并使之获得了强烈而鲜明的人文主义性质。这样一个基本认识笔者认为是可以坚持和延续的。在本文中，我试图要对原来的一些研究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对所涉及的诗人和文本再作一些更细致的辨析。

一、六七十年代启蒙主义诗歌思潮的产生基础与环境

中国古代历史上多次出现思想活跃的时期，春秋战国、汉末六朝最为典型，每当专制王权出现了分裂和巨大缝隙的时候，恰恰是思想界特别活跃和富有建树的时期。这一点早就有思想史家做了系统考察，“由‘官学’到‘私学’的进程”，导致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端，这个发端即是“春秋末世与战国初年的孔、墨显学的对立”^②。在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一体化格局中，当然不太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私学”，但在“文革”波谷时期，却出现了类似“权力真空”一样的小气候，“权力的真空”导致了思想的“私密化”。有人记载，正是在“1971年‘9·13事件’之后，在批判林彪集团的运动中，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进行纠‘左’，‘文化大革命’进入波谷时期，在1972年至1974年，北京文艺沙龙进入了它的黄金季节，在短暂的两年内形成了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这一探索在1973年达到了高潮”^③。所谓“沙龙”，正是与古代的“私学”有着某种类似之处的、具有个人性、独立性与私密性的文化与思想空间。仅据《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记载，“文革”时期活跃于北京的地下沙龙就有这样一些：

1. 以牟敦白为核心的沙龙，主要活动于1965至1966年期间，主要成员组成有郭路生、王东白、甘恢里、郭大勋等，以诗歌创作为主。

2. 以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为核心的“X小组”，主要活动于1968年前后，该小组以思想活动为特点，讨论涉及时事和重大政治问题，后被发现，郭世英被捕，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

3. 以张郎郎、董沙贝、张文兴、张新华、于植信、张振洲、张润峰等主要成员组成的“太阳纵队”，活动时间很短，但影响很大。

4. 以回城知青黎利为核心的“地下文艺沙龙”，活跃于1969年冬天到1970年，在这个沙龙中曾诞生了广有影响的小说《九级浪》（作者毕汝协）以及《逃亡》（佚名）等，这些作品明显与时代的主调不相符合。

5. 以赵一凡为核心的“地下文艺沙龙”，大致活动于1970年以后。赵一凡与大多数知青出身的沙龙核心不同，他生于1935年，父母为高级知识分子，其本人自幼多病，曾长期卧床，靠自学成材。因为年龄较大，他的思想十分成熟，所以有很大影响力。他主要以传播西方文学与哲学书籍为渠道，影响周围青年，1975年初，他以“交换、收集、扩散反动文章”的罪名，被冠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第四国际”之名，被捕入狱。

6. 1972年前后在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活动的，以回城女知青徐浩渊为核心的地下沙龙，成员众多，主要成员为画家彭刚、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等人，还有后来成为“白洋淀诗人”的岳重（根子）、栗世征（多多），已然在圈子中负有盛名的依群，它后来对催生“白洋淀诗歌群落”产生了直接影响。

除上述集体活动的思想性群落，该书还提到了一些异端与另类人物，如李坚持、刘森等，据称这些人大都有另类的外表，擅长艺术或学为杂家，有神经质的气质，甚至具有“职业革命家”的风度，他们通常也以文学与艺术为媒介，向周围青年传播思考人生、不满现实的异端思想^④。

很显然，这个时期所谓的“文艺沙龙”，不过是借助了文艺这种新鲜的、符合青年心理需要与特征的形式，来孕育并进行思想的一种方式，它的本质是以思想与文化认同为宗旨的思想性团体。现在看来，之所以大量出现这种思想的群落形式，是由于“文革”初期盲目而激进的革命思想的退潮，苦闷占据了众多青年的心；再者从个体的成长与心理需求角度看，几年过去，随着青春时光的流逝，使许多起初曾占据时代潮头的青年产生了沧桑感与落寞情绪，这是从个体心理的角度所必然要发生的转变；还有就是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他们，革命的口号不但没有换来浪漫的生活，而且还将他们放逐到了贫困与无奈的思想困

境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现实，以另一种眼光审视许多重大政治问题。而进行文学创作，不过是他们表达这些思考和思想的一种形式，一种变相的发泄方式。

从思想资源的角度看，“文革”时期在北京青年中流传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是十分重要的异端思想的来源。所谓“灰皮书”是指“文革”前印行的、专供高干阅读的“内部读物”；“黄皮书”是指“文革”时在“内部书店”发行、只能凭高干证件购买的文艺与哲学类图书。这些内部印行的书籍以变相的合法面目，在青年人中广为流传，成为这个思想匮乏时代最重要的精神营养。一个回忆者在谈到白洋淀诗歌群落形成的思想来源时，曾指出当时上述书籍和“各种新思潮的萌芽”的作用：“70年代初，北京青年‘地下阅读’黄皮书的热潮同时在白洋淀展开。除去被查封的《奥涅金》《当代英雄》《红楼梦》等外，这些青年还读到了刚刚译出供‘批判’用的《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娘子谷及其他》及一批现代派诗作。这些自由不羁的灵魂诉说，使他们饱享了偷食思想禁果的快乐，也开启了他们的心智。”^⑤

另一位在白洋淀插队的知青、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成员之一宋海泉在回忆文章中，则更详细地提到大量西方哲学与文艺著作对他们的影响，“当时，《在路上》《麦田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等书曾在知青中流行，受到它们的影响，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流浪的经历……”他提到后来的“朦胧诗”干将江河（于友泽）曾于1970年到白洋淀，带来了“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集”“梅热拉依梯斯的组诗《人》”，还有“内部出版的《现代资产阶级文论选》，这些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还提到另一位诗人孙康与西班牙诗人洛尔迦之间、多多与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之间、北岛与前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之间的特殊的传承与影响关系。甚至还提到了另一位白洋淀诗人陶维诵的男友、来自北京四中的学生赵京兴，作为一个具有浓厚的“青年思想者”色彩的人物对一般插队青年的影响：

北京四中学生赵京兴在自己的哲学手稿里，借马克思之口重申了费尔巴哈的命题：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宗教是人的无意识的自我意识。”“人关于神的知识就是关于自身的知识。”在造神运动达到顶峰的时代，把宗教的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把神降低为人，实际上是把世俗的人提高到神的位置，把对尘世的人的关怀取代对宗教的神的崇拜。

……1969年夏天，赵京兴的手稿在学生中间流传。它标志着已然广泛开展的读书活动已由古典文学领域深入到了现代文学领域，进而深入到哲学领

域^⑥。

依据这些情形，宋海泉在同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上述思想资源对知青思想与世界观的影响，指出其接近于启蒙主义的思想效果，第一是“主体与价值的转换”“个体的人站立了起来”；第二是“注重感性与个人体验”，使盲目的精神膜拜转化为对生命与肉体本身的认识；第三是“怀疑主义与荒诞”，这是其现代精神价值萌醒的另一个标志。应该说这个概括是十分准确的，事实上，革命和启蒙从来就是一个交叉复合在一起的复杂命题，“革命”的激进主义行为常常是违背了启蒙主义关于“人”的价值初衷，但启蒙常常又是以革命为诱人的目标和动力的，这一切正像卢梭在他的《论科学和艺术》中所说的，他描画了一幅启蒙世界中的壮美景象，然后对比此前的野蛮和蒙昧状态，提出了他的“革命”的理论：

看一看人类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了空虚之境；怎样以自己的理性光芒突破了自然蒙蔽他的阴霾；怎样超越了自身的局限而驰神于诸天的灵境；怎样像太阳一样以巨人的步伐遨游在广阔无垠的宇宙里——那真是一幕宏伟壮丽的景象……

欧洲曾经退回到太古时代的野蛮状态。世界上这一地区的民族，今天生活得是非常文明。不过几个世纪以前他们还处于一种比蒙昧无知还坏的状态中。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科学”的胡说八道，一种比无知可鄙得多的胡说八道，居然僭称起知识的名号，而且对于知识的复兴布下了一道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为了使人类恢复常识，就必须来一场革命^⑦。

卢梭所说的“革命”当然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法国大革命，而是说的15世纪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导致的东罗马帝国的覆灭，直接导致的欧洲文艺复兴。但他表述中对“知识”与现代文明的推崇，确实与他的革命理想联在一起。而且最为神合的，还有他的“革命的话语方式”——与黑格尔一样，卢梭所使用的话语充满了太阳与光明的形象，“光芒”“光明”“太阳”“巨人”“宏伟壮丽的景象”等等这些修辞，同当代的革命话语与青年人的革命想象之间，几乎没有缝隙。可以说，“革命的话语”与“启蒙思想的话语”之间，天然和暧昧地交叉着，重合着。这也是启蒙话语在“文革”这样的“革命年代”与特殊情境中得以存在和传播的真正奥秘。借着“红色专政”与“革命恐怖”的情境，这些青年把自己想象成受苦受难的“十二月党人”（诗人郭路生写于1965到1967年的《书简》一、二两首诗就是以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自比的）、

想象自己是被追捕或逃亡中的秘密的职业革命家（北岛早期的诗作《黄昏·丁家滩》《岛》《宣告》《结局或开始》等大都有这种色彩）、设想自己是革命和失败的牺牲者（依群的《巴黎公社》那样的美丽诡谲的诗歌）、甚至想象自己就是时代的囚徒或流浪者（宋海泉的《海盗船谣》、根子的《三月与末日》、芒克的大量“启示录”式的短章，都可以看做是这种充满“被放逐”情绪的作品，黄翔早期的作品也是这种囚徒式的情怀的表达），以此来完成他们自己的启蒙角色者的自我想象。

还有一点，“文革”时期盛行的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知青文化”，同俄国“十二月党人”和民粹主义者所奉行的那种革命信念与逻辑也有几分相似之处，虽然他们不可能做到像别尔嘉耶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赞美的那样，“英勇地承受苦役生活”“像基督徒一样地忍受自己的苦难”“他自己没有任何希求，他所做的完全是奉献”……^⑧但就其理想主义的层面，同样也包含了这种“残酷的诗意”，坚忍的牺牲情怀。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一类诗歌为什么感动了那么多人，其中所包含的对残酷青春的体味、对坚忍的人生品质的价值肯定、对“牺牲”“锻炼”“受苦”等观念的诗意想象，都是其借以感人的思想力量的来源。这些思想本身与主张个体意识、传播现代价值的启蒙主义精神之间，虽有矛盾之处，但也有很多奇怪的交叉融合之处。它从另一种假想的途径中，也满足了这时代广大青年人的一种价值想象。

显然，这一切都属于“地火”和“潜流”的范畴，它隐含于时代的封锁中和意识形态的地面下。偶尔有跳出地面的时刻，但也都是在寂暗的黑夜之中，但无论是地火还是潜流，它都在积聚和诱发之中，汇聚成为思想的觉醒与理性的成长，成为下一个时代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蕴蓄与绸缪。

二、举火的歌者：思想并且反抗着的个体创造

“启蒙主义”（Enlightenment）一词的西语词源为“照亮”之意，这和它的中文含义“启发蒙昧、思想成长”是十分接近的。作为历史范畴，启蒙主义当然是特指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前所开始的思想舆论准备，指的是自康德到黑格尔、自伏尔泰到卢梭的启蒙哲学思想体系，及其所推动的一场思想潮流与运动。但在这里，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个超越时限的功能范畴、一个文化实践的范畴，一个“动词”。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来自西方的所有思想与文化学说，几乎都可以说具有类似“启蒙”的功能；在当代中国的文

化背景与现实基础上，那些现代主义以来的西方文化思想——具有“反启蒙”和“后现代”倾向的思想，也都具有了特殊的“启蒙意义”——使我们认识到在文化封闭的状态下所完全不能认知的新思想与新文化。换句话说，哪里有意识的黑暗与蒙蔽，哪里就需要启蒙。因此在六七十年代“文革”的动乱与专制背景下，精神的光照就成了这个时代最危险，也最有价值的文化实践。当代法国的思想家米歇尔·福科，曾论及18世纪的启蒙主义与当代的启蒙主义的联系与区别，他说“康德把启蒙描述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刻，批判是必要的，因为它的作用是规定理性运用的合法性的条件”。“在某个意义上，批判是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理性的手册，反过来，启蒙运动是批判的时代”^⑥。无疑，自由的思想、独立的判断和据此对非理性（理性在这里指现代精神理性，而非传统道德理性）现象地批判，任何时代都是启蒙精神的应有之意。在60年代，一批最先通过具有“非法”色彩的阅读与思考而获得了某种怀疑精神的青年人，开始用他们独立于时代蒙昧之外的思考表达他们冲破思想牢笼、追求独立意志和批判暴力与专制的思想。曾活跃于这个年代的诗人哑默在其回忆文章中对一个鲜为人知的“贵州诗人群”做了这样的描述：

60年代中后期，贵州一伙青年诗人及文学艺术爱好者黄翔、路茫、哑默、曹秀青（南川林山）、孙唯井、肖承涇、李光涛、张伟林、周喻生、郭庭基、白自成、江长庚、陈德泉……就经常聚在一起，在文革的一片“赤色风暴”中对文学、美术、音乐作顽强的自修、探索与创作。当时环境极其险恶，在一个废弃的天主教堂里……黄、路、哑等对人文学科，特别是诗歌作全面的研讨和创作。当时他们的此举得以存在的原因是社会上派性夺权大战，各派无暇顾及社会上的“渣滓鱼虾”。在60年代，黄翔创作了诗《火炬之歌》《我看见一场战争》《白骨》《野兽》、散文诗《鹅卵石的回忆》和诗论《留在星球上的札记》等，哑默写了诗《海鸥》《鸽子》《晨鸡》《谁把春天唤醒？》《大海》及短篇小说《小路》《椋子树下的笔记》等，那时黄翔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在青年中朗诵《火炬之歌》。此类聚会常通宵达旦，有时是在郊野举行^⑦。

迄今为止，这是对“贵州诗人群”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描述，在当代文学史上，这一概念尚未被更多论者所使用，但在本书的角度看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诗歌与思想群落。事实上“启蒙主义思潮”这一说法，在史的意义，首先即是来源于以黄翔、哑默等人为首、在1978年10月前后组织的诗歌团体

“启蒙社”。这一诗歌团体的成立，在时间上早于北岛等人在1978年12月油印出版的《今天》，这年11月黄翔等人在北京西单和《人民日报》社附近以启蒙社的名义张贴的诗歌大字报，曾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的活动对于北岛等人的诗歌活动也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这从当年北岛写给哑默（伍立宪）的信中可以窥见一斑^⑩。

但从创作的实绩来看，“贵州诗人群”中在“文革”结束后形成文学影响的显著事实的，只有黄翔、哑默两人。这当然首先与地域的僻远有关，同时与这群人的思想与表达方式也有关，他们可能一度过于偏重于政治了，这反而使他们的文学余地与思想空间受到了外部和内部的限制。但无论如何，他们作为先行者的启示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他们甚至给北京的地下写作者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与启示。这一点，从北岛给哑默的第三封信中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关于办刊的宗旨是有一定区别的，北岛强调的是“不直接涉及政治”，因为“基于两点考虑：一、政治毕竟是过眼烟云，只有艺术才是永恒的；二、就目前形势看，应该扎扎实实多做些提高人民鉴赏力和加深对自由精神理解的工作……”^⑪

如果黄翔现存的早期作品其写作和传播年份可以认定的话，那么他几乎就可以说是当代启蒙主义文学写作的开山之人了^⑫，类似《独唱》这样的作品，能够算得上这个时代所仅见的表达个人精神孤独的篇章。当然其中所表达的对宗教蒙昧的批判是比较个人化和比较隐晦的，但明确表达的信息，就是与时代的共同主题“合唱”所截然对立的“独唱”：“我是谁/我是瀑布的孤魂/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诗。”它从迷茫的发问始，以“孤愤”的自答终，“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游踪/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以个人意志对抗集体意志，隐晦然而坚定。

如果说《独唱》还只是一种沉默的远行，那么标明写作年份为1968年的《野兽》，则是逼近的痛苦号叫。它用了巧妙的不断置换定语的搭配式修辞，扩展“野兽”一词的丰富矛盾的所指，并由此书写了这个时代所有人的不同而又相似的处境——所有的人都沦落成为“野兽”，不管他是残害他人还是被他人残害的，而结果是相同的，即人性、人的尊严的丧失殆尽：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